

Embodied Knowing

Conversations on the Modern Value of Confucianism

# 体知儒学

儒家当代价值的九次对话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美〕  
杜維明

Embodied Knowing

Conversations on the Modern Value of Confucianism

# 体知儒学

儒家当代价值的九次对话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体知儒学 / 杜维明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308-09460-3

I. ①体… II. ①杜…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369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1-75号

## 体知儒学

杜维明、著

---

出品人 傅 强  
总 编 辑 徐有智  
责任编辑 葛玉丹  
文字编辑 陈佩钰 (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彭若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0千  
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460-3  
定 价 36.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 序

二〇〇八年秋，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特地来杭，为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的首届同学讲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课程。三年后的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体知儒学》一书，即是以该课程的录音为基础，经学生整理，并由杜维明教授修订而成的最终成果。

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是为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培养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道德高尚，视野开阔，勇于奉献，具有历史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的领袖而设立的一项人才培育项目。为贯彻实施上述理念，“文化中国人才计划”从认知、体验、反思、笃行着手，来培养秉承中华文化之精神，具有全球视野的未来社会各界的领袖人才。该“计划”每年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三十名优秀本科生，在保持其各自主修专业的基础上独立成班，经过二至三年学习，完成学业。“计划”共设十门课程和两个系列讲座。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即是上述十门课程之一。本书以“体知儒学”命名，当与“计划”强调认知、体验有关。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课程的教学是以严肃的学术规范为准则，意在通过研读经典文本和注重创意的深入讨论，来探讨、发掘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课程的上述特点使根据教学内容集结成书的《体知儒学》成为一部颇有特色的著作。全书内容遵循杜维明教授的思路和讲课的顺序，按《大学》、《论语》、《孟子》的次序编排，书中既有杜先生的精辟见解，又大段载录了师生之间的问

答，和对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的孜孜追索，字里行间不乏发人深思的灵感、创见和智慧。

该书的以上特色既与当代儒学的杰出代表杜维明教授的思路密不可分，亦和学生多样化的学科背景与聪明勤奋密切相关。在上课前，同学们认真阅读有关文献，做好充分的准备。课上，杜维明教授精辟、系统地阐述了四书的精髓和真谛，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同学则慎思审问，师生积极互动，辩难析疑，气氛十分活跃。课后，同学们经由反思、笃行，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学的体知。这都使《体知儒学》具有值得一读的价值。衷心希望《体知儒学》一书的出版，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的关注和探讨，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是为序。

周生春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 目 录

|     |     |           |
|-----|-----|-----------|
| 001 | 对话一 | 文化中国      |
| 027 | 对话二 | 儒家传统      |
| 061 | 对话三 | 家国天下      |
| 089 | 对话四 | 《大学》何为（上） |
| 115 | 对话五 | 《大学》何为（下） |
| 143 | 对话六 | 《论语》初探（上） |
| 175 | 对话七 | 《论语》初探（下） |
| 203 | 对话八 | 《孟子》浅尝    |
| 237 | 对话九 | 《孟子》心学管窥  |
| 256 | 附 录 |           |
| 257 | 后 记 |           |

对话  
一

# 文化中国

• 文化中国的第一个意义世界以汉人为主，也包括各种其他民族，主要指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第二个意义世界包括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个意义世界就是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是和中国有接触、愿意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儒教文化圈是文化中国的扩展。

【杜】欢迎大家进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课程。在正式讨论儒家之前，我想稍微谈一点我的个人经历。

我在昆明出生，在台湾读书，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糟糕了，我永远没办法回到大陆，永远不知道中国学人在做什么了。在海外了解大陆，或是出自官方的论调，或是源于偷渡到香港的难民。当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集中于香港，在与难民的交谈中寻求素材。譬如傅高义<sup>1</sup>，他写了一本很好也很有影响的书，专门讨论广州的地方政府，其内容就是他与一个难民的谈话，呈现后者的政治经验。其实这样做学术困难很大，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非回来不可。

1978年，我参加了美国科学院组织的海洋学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大陆，并在北京做了一场名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学术报告，将马克斯·韦伯<sup>2</sup>的观点介绍给“文革”以后进大学的“老三届”。

1980年，我接受了美国第一届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邀请，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活了若干月。在此期间，我和77、78、79三届同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后的这三届都是极有才华的人，现在这些人在各个地方都是中坚，多半是领导。他们做好事，大家享福；他们做坏事，任何人都没办法对付他们——因为他们曾在最糟糕的环境中生存过，尔后又经历了最好的环境。他们中间有没有做坏事的呢？有，但大部分还是代表了我们的希望。这一批人曾经计划联合十三所院校共同发行一本杂志，每一年由一所学校负责，但第一期发行后即被禁

1. 傅高义 (Ezra Vogel, 1930-),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早期研究日本，著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广东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研究，后撰写《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 (1949-1968)》。

2.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和道教》等。韦伯在各个领域均有学术贡献，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

1. 《这一代》，1979年全国十三所综合性大学的77、78级中文系学生联合办的一本文学刊物，内容包括小说、诗歌和评论，11月创刊后即停。

2. 汤用彤（1893—1964），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等。

3. 梁漱溟（1893—1988），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曾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等。

掉了，之后就不了了之。这本杂志第一期的名字起得非常震撼，叫《这一代》<sup>1</sup>，意思是：随着我们这一代的出现，中华民族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

1983年，我到大陆参加汤用彤<sup>2</sup>先生的百岁冥寿。当时大陆正在进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陆的运动。运动期间，所有学校皆积极参加，从早上五点半开始到处都是震耳的广播，排外的言辞、批判西方“精神污染”的论调极其尖锐。有些学者说“这个运动至少搞三年”，幸好中央内部有人反对，搞了三个月，就搞不下去了。

1985年，我到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当时的情形非常有趣：来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反应不一，有生疏者，不知儒学为何物；有反感者；也有好奇者。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觉，儒家作为一个传统，特别是作为一个哲学思想的传统，在中国已完全边缘化了，没有什么影响。有一位先生问我：“杜教授，你知道在你之前也有人讲过儒家哲学么？”我说不太清楚。“梁漱溟<sup>3</sup>，1923年。”从1923年到1985年，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北京大学已没有人在教儒家哲学了。当然，儒学研究可以纳入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但是没有专门的儒家哲学这门课。我曾看望过梁漱溟先生，当时他已近九十高龄。我问：“梁先生，你记不记得在北大上过一门儒家哲学？”他说：“怎么不记得？我上课的时候来了一大堆人，但我非常不高兴，北大是反传统的大本营，他们都是来看怪物的。我一生气就不再教了，但是在红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凡是来上学的人，一个人收一块袁大头，学生不多，可是听得非常用心，而我的生活也改善了。”1923年，正是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时候，科

学主义的力量很强，鲁迅、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影响特别大，所以梁漱溟称自己是“孤军奋战”。他写了一本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sup>1</sup>，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不安。我在北大上儒家哲学这门课时也有奇特的经验。有些同学说：“听了你的课，我对儒学产生了兴趣，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关注不够，爱批评儒家，现在可以同情、了解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学生，永远不会认同儒家，永远不会说自己属于儒家。你在海外时间太久了，所以你可以说你是儒家，你可以把儒家说得天花乱坠，好像是多好的东西。我们在这边可是深受儒家之苦啊，儒家是封建余毒，没有它中国的现代化早就实现了。”还有些人说：“杜先生，你知不知道我们经历过五四运动？”我说：“我知道一些，‘五四’是反传统的。”他们说：“你听说过鲁迅吗？”我说鲁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文豪。“你听过李大钊吗？听过陈独秀吗？他们没有人不反对儒家。那你现在讲儒家不是反其道而行吗？”我说：“他们可能也有过分激进的地方吧。”

后来，我在上海与王元化<sup>2</sup>先生座谈，他的一位弟子说：“杜教授，听完你所讲的儒学，我有点感动。但你最好五十年后再来和我们说这些美妙而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现在要现代化，我们现在要反传统，把小农经济思潮、家族制度、权威主义这些封建遗毒彻底摧毁掉。你现在不要来讲儒学，五十年以后我们绝对可以听。”我说：“我已经四十岁了，到我九十岁再来讲，有很大的困难。”当时有一部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河殇》<sup>3</sup>，共六集，每一集长达一个小时，据说有上亿人看过。其基调就是中华民族如果要现代化，就必须从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初版1921年。该书系统比较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及欧美文化，曾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引起思想界重视。随着七八十年代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2.王元化（1920—2008），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代表作《文心雕龙创作论》，与钱钟书有“北钱南王”之称，另在思想史、学术史及教育思想上均有造诣，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术界标志性领军人物。

3.《河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电视政论片，共分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蔚蓝色》六集，由谢选骏、苏晓康、王鲁湘等主创，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论。

黄土地进入蓝海洋，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离开中国的母体，向西方彻底学习。我说：“走向蓝海洋很好啊，但我们一进入海洋碰到的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碰到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都非常尊崇儒学，你反对儒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都错了。”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儒学尚有很多争论。但那个时代思想非常开放，每次上课我讲一个半小时，大家讨论半个小时，课堂上还有外国学生。我发现北大是一所和哈佛等美国大学不同的世界型大学，它有一批来自苏联、北朝鲜、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当时属于苏联）、日本、美国以及非洲的国际学生。北朝鲜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不单独活动，总是集体行动，整齐划一。我很幸运，和他们的领队及一位菲律宾华裔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彼此熟悉之后，我就问那位华裔，可否安排我与朝鲜领队单独谈谈。与那位女领队交谈之后，我非常惊讶，我发现当时朝鲜的汉学并不落后。比如《李朝实录》<sup>1</sup>有两个版本，一本由韩国学者注释，一本由朝鲜学者注释，后者的注释和标点远远超过前者，是由一批没有移居南方、留在平壤的老先生编审的。这些老先生现在大半都已过世了。

1985年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回国讨论儒学。有人说我是“宣传者”、“扬声器”，也算名副其实，但我不喜欢这种称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但以极端西化为主。不过，不管是哪一派别，大家都能在一起辩论问难。

1989年动乱，我大约三年半没有回来。

1994年，我到孟子的老家山东邹县参加一个关于

1.《李朝实录》，又称《朝鲜王朝实录》，是自李氏朝鲜始祖太祖至哲宗25代472年（1392—1863）的编年史，共1893卷888册，涵盖李氏朝鲜政治、外交、军事、法律、经济、交通、风俗、工艺、宗教等各个方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为世界纪录遗产。

孟子的学术会议——据说这是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从那时开始，我回国的频率日趋频繁。

1996年，我出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每年都要回来五六次。一直以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让大家慢慢地觉得《论语》等儒家经典是一个可以细读的文本。现在有很多人讲《论语》、《孟子》，比如于丹<sup>1</sup>、傅佩荣<sup>2</sup>。他们都是值得推崇的，因为他们唤起了一般人的兴趣，将儒家的信息传播给普通大众。他们与我的工作有一种双向的关系：他们的出现是我的工作长期奋斗的结果，而这种出现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崭新的可能。我觉得学术界不应该批评这种现象。学术的发展是要分层的，有些人做深入的学术理论研究，有些人做非常精细的考据、词章、注释，有些人向大众传播，有些人身体力行……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佛教的发展，莫不如此，儒家也应该这样。所以，通过媒体宣传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受到尊重与重视。当然，如果他讲的内容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公开讨论。

1. 于丹（1965—），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教授。2006年“十一”期间连续七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解自己对《论语》的感受；2007年春节年初一到初十，又连讲十天《庄子》心得，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2. 傅佩荣（1950—），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2009年6月在《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其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各方面皆有所成，每年发表两百余场讲座。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中国呢？文化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研究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学者有时不太关注这个领域，而研究文史哲的专家所做的工作又过于艰深难懂。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区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

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我称之为广义的文化，指一个社群整体的精神体现，比如说中国文化、浙江文化、浙江大学的文化。这种意义的文化范围很广，难以定义。什么是中国文化？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是爱好和平、重视和谐；有人说是裹小脚、抽鸦片烟，是走后

门、贪污腐化；五四时有鲁迅批判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有胡适口中的中国“百事不如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

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我称之为与其他领域相区分的文化，也就是说，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不是社会，而是文化。这种文化与广义的文化不同，但也有关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我的看法不太相同，我将其称之为“添加价值”，意思是文化添加于经济、政治、社会之上。

譬如面对金融风暴，我们通过经济分析来解释它的成因，一般不考虑政治因素，因为后者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外生因素”（externalities）——外生于经济原则之外；但如果单纯的经济分析无法解释金融风暴，我们就需要引入政治因素，比如政府干预；如果考虑了政治因素，我们仍旧无法解释，我们还要将社会因素带进来，了解社会的风俗、结构、家族关系等；如果至此我们仍然无法充分说明问题，我们还需要将文化因素也引进来，考虑价值取向，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未必对问题一目了然（但文化解释必然是更加复杂并且涉及哲学和宗教问题）。所以，文化是一个比经济、政治、社会更复杂的观念，绝不可以理解为单一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有人说我的立场是一个文化立场，后面隐含着文化命定论的意思。这是很大的误解。文化命定论或者说文化决定论，意味着文化（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是韦伯的观点，更不是我的观点。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韦伯称之为“选择的亲和性”<sup>1</sup>（selective affinity）。但同时涌现的两

1. “选择的亲和性”，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历史亲和性，即新教伦理有意识且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新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一转向东亚经验，又很容易简单化韦伯命题，因此出现很多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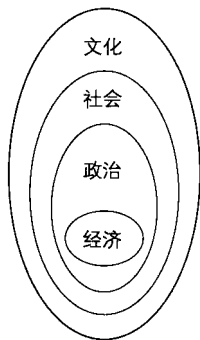
个现象，它们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有儒家伦理并不一定有经济发展。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complex system)<sup>1</sup>，将经济、政治、社会都包容在内。一个经济学家可以不懂政治，不注意社会，不关切文化；一个政治学家可以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不闻不问，但不能不懂经济；一个社会学家可能对文化的敏感不够，但不能不了解经济、政治；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要讨论文化，他必须对经济、政治、社会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学者同时要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但他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否则，他所了解的文化必然是非常狭隘的文化，他所进行的思考也会是非常薄弱而没有说明力的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思考文化问题时是全面的，也要把其他因素纳入视野。这不仅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智慧，需要对精神世界的理解。

文化的作用是很难量化的，看不到、抓不着；但它的影响非常大，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文化的考虑一定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文化的考虑一定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我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点。

第一个例子，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莱斯特·索洛<sup>2</sup>，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做了一个预言，叫做“head to head”。他认为世界上有三个经济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当时柏林墙刚刚倒塌，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以上三个地方竞争的最终成功者是德国。我和他不熟但多次见面，就问：“你为什么不考虑另外一个因素？”他问：“什么因素？”我说：“中国因素。你不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都去过好多次么？”他说：“中国可能有潜力，但我是经济

1. 文化体系



2. 莱斯特·索洛 (Lester Thurow, 1938-),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与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成员，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问题权威。美国经济政策的策划者和评论者，擅长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代表作有《零合社会》、《资本主义的未来》等。

学家，经济学是经验科学，不是坐而论道。不像你们，你们是玄想，我要根据数据来预言。中国的经济是日本经济的十分之一，要等到什么时候，五十年么？那时我们再去谈中国。”现在看来，他错误到何种程度。

第二个例子，赖世和<sup>1</sup>，一个杰出的汉学家，在巴黎、京都和北京都念过书，同时他又是美国关于日本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sup>2</sup>就是他写的。赖世和去世后，日本的NHK电视台对他的纪念节目长达好几个小时，制作单位曾分别前往巴黎、哈佛、京都、北京等若干个地方采访，才完整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1974年，赖世和在对美国政策极有参考价值的报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却只有八页的文章《反对日本特殊论》。准确地讲，这篇文章是别人根据他做的一个报告整理出来的。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日本的迅速发展是因为自福泽谕吉<sup>3</sup>以来的“脱亚入欧”。现在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威胁是苏联，而在两者之间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则是日本。日本最辉煌的时候曾一度将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买下来。大家都认为日本是特殊的，绝不是东亚文化、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赖世和的这篇文章就是批评日本特殊论的，它的副标题很重要——“中国世界的透视”（*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文章说，假如日本的成功除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价值和文化的因素，并且后者在日本的发展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以下四个地区也会发展——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我想

1. 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1910 - 1990），又译赖世和，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1956年至1963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代表作有《日本人》、《圆仁唐代中国之旅》等。

2. 《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迁》，赖世和著，1988年初版。该书以日本地理环境及两千年历史为背景，论述了日本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及二战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等，是欧美学者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代表著作。

3. 福泽谕吉（1835 - 1901），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教育家。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提倡正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应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精神，学习西方文明。1885年（明治十八年）在日本《时事新报》发表的不署名短文《脱亚论》被普遍认为是福泽谕吉所作。

当时可能还没有亚洲四小龙的提法。1974年，越南战争尚未结束，所以赖世和说，现在越南是一片废墟，假如越战结束，越南也会发展。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中国。怎么能说中国不会发展？如果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必能发挥它的经济动力。赖世和是一个深刻的文化学者，对政治、经济、社会都很关注；他也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预言家。他能有这样的洞见非常不容易，而他的洞见正是来自对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解。这也证明了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儒教文化圈”并非虚说。

第三个例子，可以让大家明白，深入了解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掌握现在的世界。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sup>1</sup>。严格地说，这本书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森斯根据韦伯的文章整理而成的。韦伯的观点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修正而非否认。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做了一场名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学术报告。报告开始我就说，“你们都知道卡尔·马克思，但你们不知道马克斯·韦伯，今天我就要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分析问题”。韦伯的观点不容易懂，但思路很清晰：一个社会（而非个人）的价值取向对这个社会的经济乃至政治行为乃至制度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前者是“独立因素”（independent variable）。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文化等上层建筑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没有独立运作的可能；经济基础不变，上层建筑不会有本质的变化。我们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的宝船比哥伦布的海船不知大多少，如果我们多向前走一走，说

1.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最初以论文形式发表，1930年经帕森斯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以及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得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关系”的结论。